

阐述大跃进

数以百万的人口失踪，过多的死亡，以及中国的比例危机

当今，无论谁谈论到大跃进时期，就会谈论到饥荒。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研究这场灾祸中有些地方有 1,000 万（现代中国人估算）至 4,300 万之间人口的死亡。有些人认为至少有 400 万或者至多有 6,000 万人口死亡，这个巨大的估算差距表明部分关于大跃进时期信息的可靠性。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死亡人口数字号召力强大，这些较高的数据不仅能轻而易举的令人信服，而且还要在学术和大众评论中令人厌恶的再三复述。绝大多数的叙事中都提到毛主席的心理和全部的个人责任是唯一的问题，而不是大跃进事件本身或是经济崩溃的多方面原因，因此说君主也有上诉的权力。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简要的回顾一下大跃进的目的或愿景，以及提出一个对其失败原因的另一种解释。

大跃进首先是一个经济计划以及农村发展战略和愿景。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人，甚至也不是按照斯大林俄罗斯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方式强制进行农业集体化。毛泽东《苏批判联经济学》的总观点是，斯大林以反动的形式进行了农村集体化，人民没有参与到其中。在经济上，它试图替代市场（物质激励和商品化的劳动力）和苏联大型的，自上而下的以及全国性的规划设备。因此，也毛泽东路线在省市和地区推行自力更生的经济。

这是一个对国防问题的考虑，鉴于美国在台湾和东亚的存在，也是一个对地方自治的毛泽东伦理的反映。正如历史学家杰克·格雷所说，“在经济方面的大跃进是理性的”，倒不如说这是当时中国式的规划理论和对资本发展主义的中国式抗衡(以及集权化的斯大林式的农村集体化)。更具体地说，大跃进不仅是一个为了发展更大公社的更大的就是更好的运动，而是一场三管齐下的运动：“劳动密集型农田建设”，以预防洪水和干旱;通过公社进行的“本地[农村]产业发展”;与“省级现代部门[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每个省将有“服务于地方发展的基础产业的中坚力量，在其协助下各县反过来可能创造自己的产业迷你复合体来向下支持下游行业”（格雷 307）这意味着，总之，是农村产业和人民，而不是追求城市中心重工业的相对特权化;重点放在内部，那些最落后的省份和地区;认识到“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增收”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热情;并坚信“群众参与发展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必不可少的”（格雷 307-8）这意味着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道德 - 政治远见，实际上赋予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特权或者以中国农村和农民为中心。¹ 平凡且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看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贫困，未充分就业的或失业的人群）不作为一个诅咒，而是作为大量可用于农村产业和其它方面建设的劳动力资源。

在当时的背景下- 或今天的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概念下- 这是毫无疑问革命性的。其基本思想是把中国最大的不利因素- 缺乏资金和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成资产。

如帕特奈克指出的，“通过将就业不足的剩余劳动力以最低的额外成本直接转化成资本来为农业生产力转化并促进工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及获得人类发展指标中的收益。”
 2 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是农村居民安置在副业产业中;所获得的资源投入回到同一社区的生产中。

大跃进标志着毛泽东的治理和论述的一个矛盾，但基本的方面：它实际上是为了分散或实施反官僚主义，并坚持地方的参与和落实执行政策和发展现代部门的主动性。这表明了强调各省、县、和村庄的直接参与，如上面的格雷注释。正如里斯金进一步解释，毛泽东的次国家发展计划不仅解决了中央计划和（不足的，脆弱的）国家国内市场的问题，也是一个明确的反官僚计划（《中国政治经济》206-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特定的国情，强调省级和地方政府努力消除“中国还未消失的历史悠久的官僚传统”（里斯金，《中国政治经济》207）。不只是进行批判，而且还积极尝试在地方政府是毛泽东论述和治理的遗产的这一有利条件下进行削减和改革官僚机构。

在大跃进的愿景中同样重要并值得注意的是其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举例来说，使用托儿所或幼儿园（美国人今天称之为日托），以及建立公共食堂，并不是为了国家对个人自由的支配，而是作为国家的女权主义：试图缓解妇女身上来自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这是一个对“仅仅是”赋予妇女在农田和工厂的工作的权力是不足以解放他们的事实的理性和政治的回应。因此，也值得强调的大跃进中空间分析的战略：城市和沿海地区有数个世纪的主导地位后，内部和内地都将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并融入到经济中，现在的“民族”将它们从对前者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克服中国农村/城市之间的鸿沟是消除贫困，贫穷和不平等的中心，今天仍然如此。邓小平派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利用市场神奇地将人拉离农村地区，并改造农村--或更准确地说城市尝试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背上，并抛弃了农村/城市层次之分。不管大跃进造成了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也有一些措施是极其冷酷和不负责任的。对于中国的任何观察家来说非常明显的是，中国的城市和富庶的沿海地带主导着中国，这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还应当指出追求农村工业化，更是为了克服体力/脑力劳动的差别，借此使农民-中国的劳动者-过去是和将来也永远会被归为后一类。这并不是希望让中国村庄留在在贫穷和孤立的状态中，也不是要在中国建造一个大城市。把重点放在克服智力/体力劳动，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中（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著作在几十年前就阐明了这一观点。）³ 这对发展而言，也就是说对消除贫困，以及对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是非常关键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中国的已经整体从邓小平思想以及后来的改革和对资本的发展中获益。但是，贫困，严重的不平等，区域差异，城市和精英的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等仍是中国巨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跃进的愿景和经济理论似乎不再像是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的让人眩晕的日子里那样奇怪的和异常。因此，也有其它人如韩东坪等等提出，虽然大跃进的农村经济肯定是失败的，它们仍然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修改后的形式当中。大跃进模式落后于在今后的几年中爆

发性的乡镇企业模式。（乡镇企业）。4 该组织方法和市场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但集体的形式和重视农村工业化和副业的政策仍是一致的。非集体化以后，乡镇企业及相关基础设施已经到位。对于中国经济的其他部分，适当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用来相当快速的构建资本主义。尽管大跃进存在灾难性的问题（饥荒造成死亡），在广大农村，毛泽东的战略最终在以后的几十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直到被取消并回归家庭农业，利润动机，和每个人反对一切的战争。5

上述大跃进的合理性和远见的显然是一个被删节的，但希望足够让人们记得，这不是疯狂或愚蠢的，而是毛泽东的论述的一部分（格雷同样指出，这符合经济思想中更广泛的趋势）。6 如众所周知 - 和毛泽东本人坦率的承认和标准 - 大跃进也是失败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争议在于它被发动的原因，此外还有它的死亡数据。我们将通过一个饥荒的程度和统计数据的使用的测试来介绍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但首先，我想回顾一下一个我认为有说服力的并且是一个非东方学者总结的大跃进的失败之处，也就是说这里讨论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前就已存在的农村经济和市场体系的重组和发展。我在这里引用了威廉·G·斯金纳的著作和他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布系统方面的空间和区域分析的工作。斯金纳的著作是错综复杂、详细和符合严格结构主义的（文中满是格子，地图和空间隐喻），但并没有正面解决大跃进饥荒和经济崩溃。这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是它的优势，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 1958 年至 1961 年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下进行的试验。他所提供的实际上是“中国”和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复杂的形象，或集镇里复杂的，根深蒂固的系统的形象（在地方、中间、和所有城市/城镇级之下的中央级的），分布和交通网络，日常的和定期的市场，庙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植根于和依赖于村的基本水平；在该层面上的人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推动整个系统运行。但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仅是血缘纽带或类似的事物，这也使得它不同于传统的，对村经济的人种汉学分析。出现在从他的著作中的是农村经济 - 大跃进前几乎所有中国经济 - 都是一个复杂分层的，交织的“铰接式的营销架构。”

这个系统大概远远超出北京或其他地方历届政府和行政部门所掌握的直觉知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王朝的。但是，这也是他们用于逐步发展现代经济 - 尤其是有计划的经济所必须掌握的知识。然而却发生了一件事，斯金纳的口里的整个传统结构于 1958 年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大肆抛弃”（109）。斯金纳的措辞可能会就他自己的经济理念宣扬自己的意图，但是这也许是题外话。跃进为更大的公社的速度和新的营销/分布式系统就是运动本身里一个造成失败的条件 - 在“更大，更好，更快”的大跃进口号和心态下，强调速度是最不幸的。但从斯金纳著作的角度看，这里的整体问题是那个之前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农村市场体系被解散得太快，而且，没有任何有效的和有组织的结构来代替它。例如粮食从有盈余地方向粮食不足地方的运动，便是受此影响。7 城镇和集市日周期等等消失了。尽管他们不可否认地造成不平等和金钱的规则，市场毕竟能有效率地发出信号，不只是价格信息，同时也协调分布，帮助做出生产决策，跨越很远的距离传递信息，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替代和改进农村传统的营销结构的结构，必然会成是主要问题。这里的重点不是放弃“自由”的市场机制本身，而是其它公正合理决策的速度，以及缺少适当的替代系统和知识结构。斯金纳的分析在我看来不是哈耶克。这部分是关于从一个传统的经济艰难过渡到现代经济的故事（斯金纳这样认为）。但这也证实了格雷的观点：大跃进的经济理

论不是不健全，但它的实施的确是很不健全的，而这反过来又与当时复杂和动荡的政治状况有关。⁸ 后者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著名的“事实”：苏联与中国决裂并撤出了中国，与美国的战争和来自台湾的侵袭若隐若现，党内的路线挣扎和这个新解放的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加快了进程。渐进主义被抛弃后，大跃进在一个矛盾的斯大林模式或形式中（“巨人症”和在一些地方实行的专制）结束了，尽管它试图开展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革命。（格雷 310）。

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进一步追求这些，这也不是举例论述，大跃进的经济崩溃的单发的原因。但斯金纳的著作没有阐明此事，并没有钻研心理学，朝政，东方专制主义或残酷，以及各种外部的、时代错误的因素，（正如下面阿玛蒂亚·森的著作讨论的那样），大跃进和它的失败再次成为需要研究和学习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罪恶和的疯狂，集体农业，共产主义等的例证。

失踪的数以百万的人口，失踪的数据

但死亡率本身才是大跃进最紧迫的问题。通过严格审查目前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汉学知识作品如何处理这一点，可以有论证地说是这毛泽东统治中最重要的运动和方面。最开始最高的数字为 4300 万人，但必须说这个说法源于耸人听闻的想象，或来自 1994 年华盛顿邮报的两条有问题的，未经证实的引用。陈一鼐，现在流亡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前任官员，只是在接受采访时抛出了这个数字作为“估计”。⁹ 陈并没有公布该事项的任何实际研究，无论是中文还是英语的。同一邮报的文章中引用了中国学者宗金（音译）声称在饥荒期间 4000 万人“死亡”的描述。但正如卡尔·里斯指出，宗给出的数字其实指的是一个假设性的“人口总损失”，包括实际的和估计的死亡人数以及出生率的下降（“七个问题” 113）。¹⁰ 我将很快回到这一点。但要注意的是饥荒死亡人数中包括的出生率下降的“受害者”是那些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生的人。这是在统计“数百万失踪饥民”时的常用策略：把未出生的人口算进去。这不是学者们使他们统计的数字超过 1500 万的官方估计的唯一途径，但它仍然是常见的。三千万以上数据之间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区别，因为他们只是在传承公认的智慧。对于媒体这当然是标准的做法。

然而，请注意杜维明 - 儒家哲学家的一个注脚，在其中他使用了引用自华盛顿邮报的相同新闻：“我的数字[4300 万]，是基于陈一缙的分析，仍有待验证”（我在这里做强调）因此较早的，休闲新闻的引用变为了“分析”杜先前说的大跃进“声称有多达 4300 万的人，主要是死于饥饿”（“破坏性”意志）。在同一个注脚中，杜也引用了一份 1961 年声明 3000 万死亡人数的中共报告。然而，事实证明，该报告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这样声明。

这是在安徽省一个县的县志里发现的一份报告，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研究报告。利用这个文件的作者们，还有杜向其推荐读者的人，实际上都没有说这是一个包含 3000 万这个数字的人口统计报告：这其实只是对目击或遭遇困难的人的采访的一份记录（杜 178n3；克莱门，16-17, 22n30）。¹¹ 同样，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群众受苦的情况；基于布拉莫尔的著作中，其中，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不管死亡的实际数字可能是多少，不论其他地区遭遇如何，安徽和尤其是四川在大跃进年间遭遇了饥饿和明显的饥荒的沉重打击。但随着杜和其他大肆宣扬千百万死去的中国人的人，我们这里处理的工作，坦率地说应该是中国研究领域令人尴尬的一方面。因此，对“饥饿”的提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大跃进期间，和几乎所有的历史上的饥荒中，绝大多数死亡病例都来自非常年轻或老年人中的疾病。分析这件事是非常恐怖的，但这样的饥荒灾民并不是真的以，也就是说，像集中营的囚犯被故意剥夺食物的形式被饿死的。他们生病并死与 - 营养不良或者更简单地因为缺乏可用热量导致的虚弱。更能说明问题是杜的意见，即在文革期间对他所谓的“政治实体”的破坏不是“毁灭的最悲惨的形式”，而是“传家宝”被家庭成员自己毁灭了（178n4）。因此生命的损失不如那些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东西重要 - 对于杜和像西蒙·利思这样的汉学家来说。¹² 因为它们毕竟是中国的精髓：它的古文物，传统和文化。在这篇文章中和其他地方，杜不断调用儒家哲学不仅作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本身的共同扩展，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在二十世纪已经丢失或被销毁了，仿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外来的，非中国的，不真实的政权。¹³

当然这不是只分析 4300 万这个数字，而是别的东西。我会再次认为，生产东方的知识，作为中西方令人忧虑关系的一部分。我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并在最后一节加入缺失的对中国的实际生活的考虑。在汉学东方主义的全球流通的标志中，中国的官方或汉学家对得出饥荒宣称的 3000 万死亡人数的结论没有最大的责任。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应是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首先在纽约书评中，以及在随后的著作中，森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新闻自由”造成了饥荒中 3000 万的受害者，并将其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¹⁴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二次冷战中，这成为一种用于反对共产主义和集体农业而流行和被广泛引用的说法，就如同 1500 万的中国“官方”数字是在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用于去毛泽东化时主要工具一样。（在写作的时候，3000 万仍然是最广泛流传的数字，但人们都在争相把数字抬高。）但是森实际上无疑引用了两个人口学家，贝妮斯特和 AJ 科尔的研究。最后一些是反过来，是来自的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大跃进官方死亡率统计（非常粗略的死亡率）。¹⁵ 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些事件发生后数十年来编辑出来的基本数字的可靠性。这个问题不只是简单不诚实。但考虑到发布的年份（1983）和邓小平政权的反对毛泽东思想和集体农业以及大寨模式著名思想大屠杀，¹⁶ 对数据的官方操纵绝不应该被否定掉。但更具体而言，里斯指出，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只能猜测被用来重现死亡人数的过程”【来自 1983 年《年鉴》】并且我们对作为这个数据基础的原材料一无所知。（“七个问题” 112）前三次普查时间相隔甚远 - 1953 年，1962 年，和 1982 年 -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和社会混乱之中，在此期间统计部门都处于停滞状态。因为缺乏社会的科学价值 1953 年的人口普查也从一开始就被批评。¹⁷

总之，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事实，我们缺乏足够的记录 - 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数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 - 为了得出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近似，可靠的分析我们需要这些记录。

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些信息缺失：一是中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共产党，只是在没有经济、政治或科学/基础设施的条件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即使在 1949 年以后还有更多紧迫的事情在眼前：土地改革，战后重建，战争和潜在的入侵，等等。在饥荒统计过程中不被承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 - 不像被殖民的印度或其他英国和法国帝国的殖民地那样 - 它从未被殖民过。这意味着多年来，比如说没有像英国那样，建起任何殖民地档案馆，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不能从中得到关于许多中国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面貌的“更好”的知识。正如詹姆斯何伟亚的研究表明，英国人实际上试图按照他们在印度做的建设殖民档案馆；但在这种情况下不意味着会实施。¹⁸ 对于汉学家来说，这也许是历史玩的把戏。但它让我们看到了大跃进/饥荒统计的当代实践和旧的，直接殖民的调查方式之间的联系。

但首先要注意的是，上述“丢失”真实数据的存档意味着所有死亡的数字必须回顾性在全国性预计的不完整的地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重建。准确地说应该没有人对饥荒的总死亡人数有把握。这并没有阻止任何人使用它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定一个信息恰恰是不可用的，并且可能不存在。里斯自己接近最后一点 - 但遗憾的是当他指出，官方死亡率的“原材料”仍是一个“谜”时又回到了原点，然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 - 也就是说，通过找到并允许访问二十年前的得出官方死亡率的人来公布此信息。总之缺乏饥荒的相关信息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许这种情况的首要后果是，饥荒的数据 - 也许对毛泽东政权的一个关键污点，并且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必须克服可怕的差异 - 必须被理解为为了积累真理制度的经验的实践，而不是作为可靠的信息。

Utsa 帕特奈克在一系列文章中认为，就算将 1983 年的年报数据作为面值，3000 万这个数字是极不准确的（1800 万-2000 万作为测量尺度）并且也是通过两种不同的、可疑的方法得到的。首先是包括饥荒死亡人数之内的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在出生的人数）；二是根据推测和预计的数据构建 20 世纪 60 年代的线性死亡率网。最后再用来推测在 1959-61 期间的死亡人数。

为了验证这第一个方法，3000 万的死亡人数被“超过 1800 万人”自动抬高了，因为许多研究者，包括了根本没有出生的“人”（“关于饥荒” 52）。正如帕特奈克所说：

[这样的学者]不仅采取[基于]死亡率上升了的可用信息的实际超额死亡率，由于人口出生率在此期间的急剧下降，还将未出生的婴儿的估计数量加入其中。

这里正在做的是估计在这些年里人口金字塔中“失踪数百万人口”的数字，但这被误导地认定为“饥荒造成的死亡”... 此方法发现与 1958 年的人口相比，在 1961 年出现了 2700 万的人口减少，但在五分之三的减少源于出生率的下降并不代表饥荒中实际死亡的人数。

（“关于饥荒” 52）

因此，不存在的人被包括进了中国的饥荒受害者中。这样的学者没有为列入降低的出生率提供正当理由，尽管此举不合逻辑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根据帕特奈克的说法，在其他国家这并不是研究饥荒的一贯做法。在这里，我们有关于中国的区别，尤其是用于中国的双重

标准的另一个实例。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出生率下降可以而且必须部分地由明显的，众所周知的大跃进大规模公社化的因素来做解释：大规模动员农村劳动力（工作周长，甚至超越了生长季节），并将其安置到新的工作地点，一般的社会革命，在生活和工作模式的突然变化，粮食短缺。就像存在一定的求知意志，透过纯粹的冷漠来认识实际生活的中国。分析必须适应一个先验的结论 - 大跃进，毛泽东思想，或者集体化是邪恶的或不合理的缩影。这将是符合东方思想的封闭，循环性的，但也可能是某种类型的不正当的欲望企图将死亡人数从东方“众多民众”里抬高。毕竟，难道千万饥民（帕特奈克的修订数字）对于元帅来说不足以成为经验上的“证明”来做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或显示饥荒的规模有多大吗？用国学经典的一句话来说，这就像死亡必须是“中国的比例”一样。

然而，也许 1000 万这个数字是不够让人信服的：这样做的真正恐怖的是，这种灾难对于中国的过去和更普遍的发展国家来说十分正常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处理国际环境。莫名其妙将中国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就像中央王国那样的陈词滥调应该被否定。帕特奈克指出，即使中国官方 1960 年的最高死亡率仅比同年（非饥荒年）的印度死亡率高 8%。

对此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觉得相当震撼。几乎同样数量的人在同一年死在了民主资本主义的印度：一个不愉快的，但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森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为了公平起见，森指出，当一个人比较中国和印度在大跃进年间的死亡人数时（1958 年至 1961 年），每年死于印度的人数比中国多 400 万人。¹⁹ 这不会改变显然因为中国的大跃进失败和经济崩溃死亡的人数不应该这么多这个问题。但它也是惊人的，并且至少可能被视为为了大大削弱作为历史上最糟糕的人类灾难的例外论。所以中国境内的粮食减产，包括政府采购，每人平均食物量 - 测量饥饿的一个关键因素 - 在同时期仍“比印度高”（“共合体”¹²）

因此，最后一点或许增加了斯金纳的说法的可信性，即中国的失败是分配性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国际背景下的中国，饥荒是可耻的“正常”。帕特奈克另外还指出，在饥荒期间中国的死亡率比在 1955 至 1960 年间十八个发展中国家‘正常’的平均粗死亡率“低”（“经济思想” par 25）。

因此，尽管饥荒仍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类福祉和发展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它仍然不能按照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要求的那样发展。

如果死亡率下降到了 1000 万-1500 万的区间内，如帕特奈克的和其他人的更严格的估计那样，那它将远非“历史上最伟大的饥荒。”这应该更难简单地归咎于毛泽东思想，该传记的毛泽东本人，共产主义，或农业集体化。所有这些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责任属于谁尚无定论 - 尤其是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和大跃进的总设计师的毛泽东。但这显然比已被公认的事实复杂得多。似乎是在处理一件许多人都需要为此负责任的悲惨事件，也是经济或资

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在到处传播并“殖民”着世界：在发展中国家付出的沉重，甚至是灾难性的代价。

因此，也有其它因素导致了饥荒，但不这些因素能放置在毛泽东，干部和集体化的脚下。这些因素包括全国范围内 2 年严重的洪水和干旱。这是一个潜在的方便的借口，也是其中一个官方的理由。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干旱和洪水也是中国真正的，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是三峡大坝工程的目的之一）。阿德里安·尚还认为，1959 年到 1960 年（152）间的干旱和洪水“损害了近 50% 的耕地”。姚树洁也认为，恶劣的天气（除了像深栽这样的错误的政策）“在减少粮食生产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1369）。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全国性天气和干旱的记录是否可信。但恶劣的天气及其后果肯定是一个合理的因素和潜在的不利现象，特别是在全国动员的混乱时期当事情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背景下。同时自然方面很少在学术中出现；1960 年，正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苏联撤回帮助也少被研究者提及 - 援助、工程师、工厂建设者、蓝图。这些因素都不能为饥荒作解释，但这恰恰是重点所在：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无论是狂热情绪，还是规划和政策本身都不能单独造成整个局面。正如里斯金指出，“自然条件和人为错误共同造成了[危机]，虽然无法评判双方的责任各占多少。”（里斯金，《中国政治经济》）埃克斯坦很久前便指出，“大跃进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一个失败的概念，而是一方面是天生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另一方面执行不力以及技术上的缺陷。”（中国经济革命 59）。20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理由超越埃克斯坦的，里斯金的，或帕特奈克的平衡数据。专制和疯狂非理性的假设---作为与革命激情的对照---是天生还原的，因为是对共产主义的罪恶的独白。在这个意义上，“秘密”饥荒的“启示”更多的是与东方主意和残余或胜利的反共产主义有关而不是新的，可靠的知识。然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回忆和恢复大跃进及其参与者的散漫的复杂性和自我认识。

例如，人们应该将在公用厨房被吃掉或“浪费”的粮食归咎于对政府或农民的不负责任，因为有一些汉学家也这么认为？²¹ 同样，这些相同的公用厨房，像集体化托儿所，缝纫组等，都意味着“从”女性的工作“删除平凡的烙印，促进妇女更充分地参与各级经济”（里斯金，《中国政治经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在革命中女性解放的一部分。因此，也韩东萍在他的人种学研究中认为，农民早先支持公共食堂因为他们想拥有与城市职工相同的特权。²² 并且如上所述，在文革期间又回到了大跃进中的农村策略；根据许多学者，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的农村“起飞”的基础。²³ 大跃进中汉学东方主义的反知识的势在必行：大跃进作为毛泽东派在文革中的署名，必须被积极妖魔化，它的真理被创造出来。

否则，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看到毛泽东农业战略和毛泽东思想在其在农村发展和人类福祉方面的成就，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失败。正如他们的失败将不得不被看作是更加人性化和可解释性。因此，没有非常高的，有问题的饥荒死亡人数，TINA 形成（没有课替代的）对向的经济改革和中国所谓的“成为一样”将充满争议。

为避免犯规，让我们回到死亡率统计数据以及巴尼斯特和科尔如何得到 2700 万-3000 万的死亡人数上。通过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森的方法 -- 他们在揭露饥荒的“真相”工作的重要性，保证了他们的方法的详细分析。不得不说，比那些简单添加“未出生的人”或不存在者的人更复杂。首先，他们拒绝使用 1953 年大规模调查中的官方出生率，取而代之使用更晚重建 1982 年的人口普查，以根据他们自己的计划向后推算 1953 年至 1964 年间新的，更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当时没有人口普查的情况下）。²⁴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这些年中出生率的假设性增长是极不可能的，并远远超过了更稳定的印度。虽然作者拒绝从 1953 年到 1964 年官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们保留当年的官方人口总数，仿佛这些研究既可以是完全不可靠的，同时也是完全值得信赖的。这也意味着，由于总人口为同一个已知量（到 1964 年接近 6 亿 9000 万人²⁵），那么所有这些“新”的人一定已经死亡了。这使得总死亡人数比两次普查之间的总死亡人数大大提高了 60%。（“关于饥荒” 60）。

这些人口统计学家专断地²⁶ 将这些新的死亡人数作为突发事件加入，当然是在大跃进期间这是一个惊人的循环争论：这些死亡必然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因为这是一个已知的灾难，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出现了这些死亡。再次，我们在这里就仅仅认识到了它的本质么？

这也不是所有一切。两位作者遵循“线性趋势拟合”的方法得到了“超额死亡。”的数量。在建立起新的，高死亡率后，作者们必然会显示在随后，大跃进后，两次普查之间那几年的死亡率激进，巨大的跌幅以得出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知”总人口。这里所了解到的，正如帕特奈克注意到的那样，任何社会的死亡率“始终表现出非线性发展”；死亡率年年变化，摒弃不会逐步下降到零点（“共合体” 12）。²⁷ 后者将预示死亡不存在，也就是中国人是不死的。如果将下降的死亡率延长并超过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到 1990 年，甚至只到 1977 年（班尼斯特）将实现零死亡率（对于科尔）（“关于饥荒” 60）。简略地说，预测死亡率的线性趋势，并由此认为死亡率会大跃进前和之后的时间里继续急剧下降是非常荒谬的。帕特奈克的言论是值得注意的：这是一个从未使用过的计算“过剩”死亡数的方法，而目前只被用在中国过（“关于饥荒” 53）。²⁸ 似乎中国的差异再次造成了影响；在知识生产方面和其他方面，中国受到的对待是不对称的偏心的。²⁹ 因此，一个产生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的知识方法还产生同样的神话般的成就 --- “中国的比例。”我们假设毛泽东会被逗乐。但线性趋势拟合这种方法被用来进行研究后恰好向阿马蒂亚·森证明了大跃进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讽刺：博学的，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与所谓的毛泽东时代最慷慨激昂的中国革命的不理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专家从没有真正预测或估计过死亡率的消除。我们可以看到在区域研究方面和专家以及牙科医生之间讽刺的相似之处。两个阵营，从后者喊着出名，务实，反理论的口号来“实事求是”到前者的社会科学信奉的不能弄清事实是如何造成的，为什么有些统计的数据比别人多，以及搞清楚他们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非反射的经验。

但是，这不是简单的，或者不仅仅是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认识论和学术困境。它是东方主义本身，不只是知识还有福柯和阿尔都塞等人令人难忘的理论中的力量知识，并且所述进

一步采取。对于什么样的人口统计学等。事实上证明了东方学家的位置优势 - 外来的材料绝不允许比现成的结论占优势。对于所有的对客观性要求和以独特的方式了解到了“真实”的事实，这样的工作其实是反经验主义，自我封闭和循环的。

普遍的饥荒结构

关于大跃进，一种写作体裁重新出现了 - 远远比上述经过验证后，有问题但仍符合学术标准的那些方法更具影响力。这些“交叉”的分析目的是要使大脑模糊或“专业”，同时吸引大量观众 - 不完全是机场书店页面，而是更“深入”并远不如威廉·斯基那或 UTSA 帕特奈克的研究“客观”。与大跃进相对比，关键的主题实际上是贾思帕·贝克尔揭露大跃进的新闻-露骨的题为饿鬼：毛泽东的秘密饥荒。在此该书出版于 1996 年之前，然而，在学术意义上还没有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存在大饥荒这样一个秘密。这场危机和政策转变总是众所周知的，而饥荒几乎没有得到大肆宣扬，总有关于它的流言。总之，饥荒问题大致总是关于范围，数字和的原因。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上面所讨论的 80 年代初的 1983 年年鉴里就已经没有保留地揭露了秘密。今天在百度快速的网上搜索（中国的 Google.com）会向你显示 1400 万以上的饥荒死亡人数的内地页面，而像很多其他的集体主义时期一样，大跃进在中国的网络空间和媒体上被相当程度的妖魔化了。那又是谁的秘密呢？有观点认为，东方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和难以形容的恐怖）那里的人狡猾，不诚实，等等是西方流行文化中的标准观念，不难看到贝克尔的文字 - 有意或无意地 - 面对的正是带着这种观念的观众和市场。这是除被揭示出的事实的真实性或虚假性之外的一个单独的问题，但它也不应该被忽略。贝克尔的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大众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在研究上对将新闻，甚至八卦类型的文字作为不容置疑、强力的证据毫不避讳。贝克尔的书适合这种模式：充分描述了在中国的古代历史里最黑暗的时期，人吃人的故事，堆叠的尸体到处躺着，酷刑，死亡集中营，等等。除了耸人听闻的风格，这里的问题仅仅是一个 - 再一次 - 图形文字中来源不明的数字（耸人听闻的细节是这本书的主旨）：“受访者”不记名，在文中提到但没有引用的“文件”（也没有提供给其他研究人员），统计数据和数字随便到处出现，等等。³⁰ 这是属于黄色新闻的模式的一篇文章，带着大量的东方主义者轰动效应。叙述以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奇闻异事或“事实”为基础，然而特别迷恋于对中国人吃，想吃，或者没吃到其他（死的）中国人的描述。但对所谓的事实或对经济崩溃和饥荒解释稍加分析 - 的偶然因素似乎对不人道东西 --- 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追求造成的邪恶，疯狂，和非理性。对于一本强烈推销其学术的凭证的书，它几乎没有意识到关于死亡和出生率等上面讨论的棘手但至关重要的统计难题。

《毛泽东的大饥荒》是在耸人听闻交叉模式下的较新的文章，出自于居住在香港，研究现代中国的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迪克特（冯客）之手。尽管它仍然赞许地推荐贝克尔的研究，但与之相比，这是一个较为学术的研究。它是基于在众多档案资料之前无法从中国的几个领域。（但不久，我们将需要解决什么“立足”的意思在这里。）这些文件的发现和利用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壮举并且对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即使研究助理和大陆良好的

信息来源发挥的作用被轻描淡写了。它至少似乎参考了真正的史料 - 尽管其他人看不到 - 使这本书与比贝克尔、高文谦、张、哈利迪以及直线上升的煽情记者的文章类型不同。³¹

但有时它仍依赖于一些同样畅销及分析几乎是相同的研究著作。例如，由毛泽东的前临时医生李志绥写的一本著名/臭名昭著的毛泽东传记，常常被引用，但一直被批评为是对毛的中伤，它将毛泽东形容为一个充满着“个人阴谋和[个别]权力斗争”、苟合，等等的生物（高，战役 115 和各处）但是对于引用李的书没有任何警告（实际上这是在二，三十年后再现了与毛泽东逐字逐句的对话），而是在编后记里写上，它已被“一些汉学家诽谤”，并且可以通过没有指名的 - “党的档案”来验证⁽³⁴⁶⁾。

在叙事分析和代表性策略的层面，冯客的和贝克尔的等人的文章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这些档案文件，这里大跃进出现的形象甚至比贝克尔的文字更加恐怖和生动：食人（再次），暴力（被干部和警察殴打），凶杀，监狱或劳教所死亡统计，以及 - 更有益，如果少了些耸人听闻 - 劣质建筑，不必要的伐木，腐败行为，关于产量和政策执行的虚假或夸大的报告，等等。有部分的研究，换句话说，证实了以上斯金纳和格雷提出的大跃进的经济崩溃（缺乏营销结构以取代以前的制度;政治动荡;独裁）。但是，他们的言论非常含蓄，且仅当你知道前面的实质性的分析的时候（此处未引）。因为对于是什么导致了崩溃和饥荒理论几乎没有持续的分析。

重点一方面是在局部细节上，另一方面是关于毛泽东和“朝政”的报告文学。一个当地例子 - 传闻声称在一包肉里发现了人耳和鼻 - 代表了席卷整个国家的食人和饥饿，并暗指这是由北京方面的失职直接造成的。（³²¹）我们在脚注中发现，其他两个在同一页上引用的“真正的”食人事件来自警方的供述;鉴于笔者的其他关于国家暴力的报道，很难知道为什么这些供词应被理解为自动合法的。³² 书的研究方法是一方面引用最高水平上的大跃进计划和讨论，然后在另一方面分析一些地方级的恐怖现象或细节 - 作者暗示 - 同样归咎于被称为毛泽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阴险的决定和行动。这是自上而下模式的分析。但问题依然存在：两者关系是什么，因果链，或推理吗？总之，两个水平之间的间隙，以在它们之间缺乏持续的尝试来以一个辩证的方式或通过一些其他分析来调解，除了再作出有关总国情的彻底的声明之后有时回提供像“。。。的净效应”，“例如”或“比如”这样的姿态。

用代表性问题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冯客引用了声称记录了毛泽东曾在 1959 年的高级别会议上说的话文件：“最好让一半的人死亡，使另一半人能吃饱”（¹³⁴）。这是应该受到谴责和不人道的。但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这句话（由一个不知名的作家间接地记录下的），像这本书引用得其他话语和档案一样，似乎断章取义，既没有解释也没有说明：它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自我解释。它出现在关于粮食征用的一个段落里，关于这些和国家农业生产的很短的一章中。1961 年 - 两年后，邓小平在另一个会议上说到 - 实际上更多地是指四川人民的坚毅。言下之意 也没有说出来 - 指的毛泽东等人在 1959 年以前就知道粮食短缺的情况但是仍然继续征收越来越多的粮食因为人命对他们来说不值钱。但没有证据表

明，他们很早就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或者说他们没有试图缓解饥荒。³³ 这是与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及杰克·伦敦认为中国对人生命的价值不重视相同的逻辑。还有一句话与其他脱离语境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类似：最有名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因为与美国人相比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所以让他们轰炸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音“法西斯”，但这是在遭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攻击时对士兵说的），造反有理（因此“将你们的老师扔到窗外”），等等。

更具体地讲，这里的所谓毛泽东的讲话是模糊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次会议谈话的背景和冯客也没有向人们提供。我们不知道这行之前或之后的语句，或者是文档的样子。毛泽东通常是讽刺和轻率的（通过秦始皇引用的至少一次阅读，开尼克松的玩笑，等等），以及在他粗俗的讲话和习惯。在对他的个人崇拜和反面的妖魔化之外，我们对他的个性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他没有良好的感觉。存在很多个毛泽东。但在交叉类型中只有一个是傅满洲式的。³⁴ 这并不意味着辩护：我们实际上对毛在这里的意思还没有明确概念。这可能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计算，一个痛苦的话语，明显的事实或别的东西的一个假设性陈述。

没有看到文件本身，以及了解其背景情况我们不能做任何评判。这将反过来，引起一趟前往甘肃档案馆的旅途，以获取对作为整体的文档的感受。

甘肃不仅遥远，人们还需要相当多的关系才能接触到该文档。对于许多在本研究中没有被引用的文件中的大部分来说，情况都是类似的。这部分是由于档案研究的性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但它也使他们无法被证实。但在文件的是如何被展示，阐释，或合成的（或他们是如何没有这样的）方面还存在一个问题，正如我一直在试图论证的上述问题。

然而，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希望中国核战争中被轰炸，饿死群众，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知道，在危机期间的不同场合上毛泽东宣称过，他希望一些农民袭击粮仓的报道是真实的，否则他们可能会挨饿。通常被人们承认的是，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里，毛泽东批准的各种叛乱，甚至对更多的普通公民当中“右派”的行为的允许是相当一致的。这并不能否定关于地方殴打，饥饿，等等的任何报告。但它确实表明，中央的政策和命令与地方实际发生的存在差异。这是治理中的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辽阔、充满多样性的国家更棘手。在这项研究中的作用又是妖魔化毛泽东为残酷独裁者，以对演讲或会议，或经济崩溃和粮食减产的过程的持续分析为代价。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冯客引用的“铁证”的文件真实性（甚至一致性）- 来自甘肃的“最好让他们饿死”报告被孙万国质疑了，他是一位毛泽东时代，由来已久的批评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学者。孙认为，冯客单独的文件和会议合并于一体，而且认为“让他们饿死”引用指的不是人类而是要在那时削减工业项目（见孙，2013年，和即将出版的）。除了与孙万国相同的其它回应之外（如O'格拉达，上面引用的），关于冯客攻击大陆的

作者和在《墓碑》投稿的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申的进一步争论已经爆发了。杨的书和冯客的书蕴藏着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它首先做了并且做了很多相同工作 - 大跃进危机期间轶事、困苦、饥饿和灾难的例子的记录，盯住所谓的只有负责的作者才能看到的档案文件。

这不太煽情，但在政治上和概念上颇为相似。尽管杨的死亡人数统计是类似的（3600万），尽管杨依赖于右翼反共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书中的比较罕见的社会和因果分析，冯客仍然（具有讽刺意味）贬低杨在《墓碑》的成绩和他的学术声誉（见约翰逊，2012）。右派（定义为反共和反国家的对市场秩序的‘干预’）内典型的男性胜人一筹和学术‘草皮’战役，以及宗派主义。然而，杨除了写出这本现在被禁止，但广泛，普遍阅读的书之外，他还没做过其他事，就像他自己的赌注与那些对信仰转换者的进行说教的旁观者非常不同。

但问题的另一个很大部分是与传统史学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墓碑和毛泽东的大饥荒充其量可以说是传统的历史，如果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论战）：叙述性的档案故事，报告或关于一个必然的当地事件或统计信息的轶事，在被认为是在任何地方都在重复上演的不记名的模式下站出来代替了全国。但事实能够胜于雄辩吗 - 即使是令人不安的，生动地渲染了一下，比方说，殴打或者同类相残的事实？什么样的代表性事实能够代替全国几百万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当地情况？根据冯客（以及杨）所采用的方法，以便将饥荒和大跃进作为一个整体得出公平和充分的代表性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在有中国各地各级地方类似的报道 - 不仅仅是省，还有县，镇，村。总之，地图上应该与广泛的领土共同扩展，就像何塞·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经典故事里那样。³⁵ 关于这一点存在强力的不可能性，党和国家为了控制档案的查阅为尽可能多的设置秉承这一方法的代表性限制。中国简直是太大了，可以这么说，我们可能不会有所有这些活动的充分记录，特别是在动荡的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即使是冯客作为重点的地方一级。

绘图问题也是为什么人口和死亡率全国合计的统计数据是必要的；但正如帕特奈克，里斯和其他人如上所述，我们没有充分具备这些条件，并且对于大跃进和毛泽东时代，他们往往最多是可以追溯的。因此，各级之间的调节问题是根本。³⁶ 或者换一种说法也有一个规模的问题在这里：考虑到中国的庞大面积有可能所有这些选择的以档案为基础的故事是真实的，但还是远远达不到被转化详尽图像的标准，更别说大跃进饥荒/崩溃的具体数字。人们可以毫无疑问的武装起研究生研究者的另一只筏，送他们到现场，并最终拿出同年里平静甚至是田园诗般的纪录。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数字问题（饥荒的死亡率与普通的死亡率，人口等的对比）是如此的重要，却又如此令人沮丧和失望。在关于死亡数和档案馆最后两个短的章节里，冯客似乎暗示着这样一个大跃进的限定性数字（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并推测的死亡将是可能的 - 尽管他自己的详细的描述了至今为止记录、估算、和档案馆是如何的匮乏（尤其是国家的和那些官方的史料），以及这些资料受到了多严格的管制。

这是一个有趣的渴望和求知欲，尽管有大跃进饥荒的子域的特点以及现代历史和社会科学学科逻辑的特点。他自己统计的死亡数字是“至少”4500万，从而提高了从班尼斯特到寇尔以及之前无处不在的3000万的赌注。问题是，关于其可靠性，在“最后的帐簿”一章中只额外提供了没有询问当地档案或国家资源的一个运用；总死亡率的辩论，列入“失踪的胎儿”，“早熟”和“过剩”死亡之间的差异还没有得到承认。对于在大跃进的死亡率，冯客引用了刘少奇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约百分之一“正常”比率（329）。撇开刘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与前面提到的一样有问题：死亡率本质上是非线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提前说什么是“自然”或“正常”，尤其是对于这个时候的中国来说；1983年年鉴的官方大跃进死亡率的数据（1500万）可能是误导性的，并且是公认的“粗略的”；鉴于这一切与1953年到1964年之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缺失，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活着，他们在哪里（群众动员和搬迁使这个更加难以猜测）。笔者随后将来自刘少奇的死亡率与在各种省级的带有具体死亡数字的报告和县或地区的死亡或近似死亡率相比较。刘少奇的“正常”死亡率和地方文档之间的差异或“不一致”，总共高达约4500万（333）。

档案的引用在一个层面上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似乎如此具体和真实），但在另一个层面上问题重重。例如，对在农村一个随机的县报告的死亡率的计算能有多可靠，一个县很可能不会有资源来充分进行统计？那4500万人中“失踪的出生人口”占多大的比例，或者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密切的联系？要再次引用里斯金的话：“大跃进遭遇了统计的停滞和信息的完全政治化”（“七个问题”119页）。总的来说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现象，肯定可以想象，冯客的一些地方文件，可能作为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已经在事后被调换了，或在记录/编写时收到了影响（如越“线”）和“狂热”。为了得到4500万这个数字，冯客还依靠了曹树基和陈一兹的研究工作。我们已经调查了陈的研究的可靠性，据称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高级别报告里看到或读到的东西仍然停留在道听途说的水平上。大陆学者曹在“过千”的官方的地方志（329，332）的基础上预计有3200万人死亡。此死亡人数可能是准确的，或者不是。关于曹的方法，以及他如何得到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什么讨论，虽然冯客的确采用了他的来自大量实例的县级数字，从而将它们添加到自己的资料的数字中了。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不能看到或读到个别的地方文件来确定他们的可靠性，所有的 - 甚至是大多数 - 县和更大的地方没有被标明/存档（缺乏领土完美的地图），还有未知的或不可靠的国家死亡率，甚至人口总数，等等。最起码，冯客声称“死亡人数由此确定在了最小4500万的超额死亡人数上”，是过于自信的表现（333）。37已经进行了1000万，1500万，3000万，等同样有效的案例。事实上，那些转向1000万数量的理论似乎更为严格并且语义丰富。至少在理论上，数字可能会更高。但如果不存在万人坑和一些被记录下的，关于大规模饥荒的集体记忆，那么这是极不可能的；这些证据尚未被发现，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冯客注意到较高可能性，但不是前面的，较少数量的数据。匆忙帕特奈克也没有讨论什么才算是“过剩”死亡和“正常”的死亡，

只是因为甚至没有由斯密阿玛蒂亚森提供的可供对比的全球性分析。这一切都不能否认一个明显的灾难。但是，要搞清楚当我们谈论饥荒的死亡数字我们要谈论什么。

全球性的枚举方式？

毫无疑问，中国会对“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数量会继续寻找下去。鉴于对确切数字依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许更为有趣或紧迫的问题是，为何对此项统计做出如此大的努力—或者，更成问题的是，为何要公布数量更大的估计？除此之外，对于毛泽东和革命的记录危在旦夕，同时受到波及的还有集体农业和共产主义的价值，甚至是现任政府的合法性。还有一个老一些的，少冷战屈折结构或现象：西方的位置优势和专家优势，等等。因此，产生了一个共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对饥荒的发生负责（无论是 1000 万还是 4500 万的过多死亡），人数的记录和灾难的原因—最后还远远低于数字问题的分析—高度的政治性原因有一些竞争性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要痴迷于数量的计算呢？有可能是另一个隐藏的动态，此动态我们现在是可以去探索的。这使得我们返回了现今存在的世界移民遗产的问题，即使是处在知识生产的水平。

首先让我们回到 Sen 和大跃进/饥荒知识的全球性背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来询问他关于中国的全球号召力、食物、饥荒的观点，因为 Sen 不仅普及了饥荒膨胀的数字，还包括其原因和治疗：缺乏“民主”和“新闻自由”。最近 Sen 对民主的界定是援引“在野党”和“政府通过讨论”的陈词滥调。（“民以食为天”776）。但并不十分清楚中国各方面在这个时候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除了刘少奇等人进一步的权利等。在漫长而可怕的内战中，刚刚击败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国民党。有太多的期望希望他们回到这个游戏中来。鉴于之前对大跃进的讨论 38，以及早在 1959 年由中央提出的快速识别的问题 39，很容易看到 Sen 的因果因素是很诱人的，但其陈词滥调也是空洞的。他的左翼评论家确实在印度看到过他们这样，印度具有很好的理由，它无疑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具有新闻媒体自由—与 1960 年以来的中国相比，在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识字能力、粮食供应方面有更为糟糕的记录 40。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如上所述），在 1958 到 1961 的大跃进期间，印度有比中国（包括所谓的 3000 多万的饥荒难民）更高的死亡率。他对于“新闻自由”的观点也是证据不足的，但是 Sen 将此观点作为显而易见的结论提出来，是他观点的依托。因此，很可惜，他没有咨询到 Jean-Luc Domenach 关于他 1982 年对中国一个饥荒严重的省份（河南）的研究。同时也意味着对革命同情者的还击（将大跃进看做非理性的“疯狂”），它从 50 年代以来的省级或者是地方报纸中广泛的借鉴经验，大跃进期间出现了经济危机（167）。有趣但不无讽刺的是，Domenach 的工作告诉我们，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危机，都以字面的形式被镌刻在当时的当地媒体和印刷媒体上，并进行宣传。对新出现的危机信息不进行压抑，或者在人们读完 Sen 后，至少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压抑。大跃进期间一定出现了信息危机，但不能很明显的看到“新闻自由”的情况，这意味着确切，或者是可能，国家机关可以得到更快或更准确的消息，相对来说，命令的官僚体制链也已经到位。通信问题比起其他问题又更为严重，这又将我们带回过快和“肆意”的对农村的营销和分销结构的放弃。如果当地的干部和领导人没有

正确的发现和传递信息，那么怎么会有一些公认的调查记者这样做？（他们将会从哪里来？）

这一切都不是要去拯救或者说教中国媒体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状态（特别是今天）。但是大跃进的崩溃是复杂的，Sen 强烈建议的两个因素几乎无法阻止饥饿本身，没有比他们更可以阻止严重的干旱和洪水的了。这进一步暴露了 Sen 说法的陈腐的本质，鉴于 Sen 的关键词含有自我奉承的本质，中国惨遭缺少什么，我们和现代印度都有，这是不难看到的直接上诉的观点。它适合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冷战背景下，上世纪 90 年代共产主义终结的胜利冲昏头脑（尽管关键不包括中国）。更何况，当我们回顾到上诉的到场情况：自由市场、新闻自由、自由资本主义民主都是必要的，这是避免饥荒，使得社会真正进步的方式。⁴¹有人说“民主”和“新闻自由”是形容资本主义的。从 A. J. Liebling 旧语看，

“新闻自由只有保证那些只有一个人的情况”。Sen 和其他人声称信仰自由媒体/市场/民主是当代的：如果不是国家的主权被捕获到市场，公民社会正在被纳入，或者已经被置之不理（如入侵伊拉克），世界各地有巨大的收入差距，等等。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被捕获的市场和资本，因为它拼命的扩大并推进这些危险。我认为中国以及其他革命者和激进的国家领导人，可以花一些时间，了解西方的问题、殖民的问题，苏联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形态，并试图找到另一个路径，包括通过新闻和国家形态，对维护“先锋”国家和民粹主义的利益具有责任。他们在此项寻找中可能会失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决定是不合理的，或者他们对原有的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形式分析是错误的。Sen 的话，他的诺贝尔奖和他的荣誉，作为一个人道和欢迎“宏观”的经济学家，经过时间证明，是无益于大跃进饥荒的。

在中国文献中，尤其是中国 30 多万的死亡人数，是 Sen 自己至关重要的工作，因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他还是没有解决低死亡率估计的问题，或者可用的原始数据和普查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的工作，是一件作为转变西方观点和得到全球谅解的事：以相同的逻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毛泽东时代破碎之后，必须遵循普遍的发展道路和现代化的规律（市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自由）。当然，这是最近一篇关于中国如何进行治理的文章看待此事的意见。其标题显示了中国知识生产的规范范围：

“后毛泽东时代的转变：从服从领袖到“正常”的政治”。“正常”加引号是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但总有一天，会盲目的服从皇帝或政府的法令。⁴²在殖民主义和其形式的相关知识中，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理论认为，英国人使用的大量的调查模式，是通过知识生产来对印度进行执政。一个在本文上下文中特别相关的是枚举形态：对于饥荒学者和他们求知意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时“巨大的数字”，必须客观化的进行分类和管理（科恩 8）。档案必须要打开，统计和死亡率必须要生成，在此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的。整个团队的研究助理必须前往中国，寻找文件和档案的信息，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验证了共产主义与民主或市场的一个先验结论，才能知道 1949 到 1979 年之间的噩梦，中国到底错在哪里，或者哪方面缺乏等等。真实的，想象的，对大跃进时期中国的生存和死亡情况作出预计，从未知的、未出生的“过剩”，必须生产，然后进行计算。趋势产生这些数字，这远远超过了大跃进及其经济失败的因果分析，实在是令人感到好奇。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是因为有中国或者是现任中共。中国研究领域可能是一个地方留在原地，也有涉及到一些股权，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股权，关于战斗、或者反对共产主义，集体

主义，替代和普遍的现代性，等等。这是这一领域的吸引力，至少是对于那些不迷恋于事物的古老而重要的华人。“中国”可能是最后离开的，人们可以占用它，针对奥威尔式的政权的过去或现在讲实话。在心理学化的风险中，这是一个极为诱人的主体位置。（左，右）这是中国对其政治获得解释的区域。数字游戏和中国的解释被放入朋友/敌对分子对立的党和国家中。尤其是参考毛泽东时期机器革命。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学术和更广泛的中国想象必须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的朋友/敌人做出区分回应，后者继续作为“共产主义”和“集体化”前者是一般的通用人，苦难的中国秘密的憎恨着这个政权，无论其知道与否。这样的动态未获得南亚研究的比较多的学术界的认同，例如，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没有相对的股份。但也围绕有“中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跃进是多么的悲惨与恐怖。冷战仍然与我们同在，这不仅仅是美国与西方关于政治和经济的霸权主义，还涉及到话语权和思想水平。这与殖民主义向重合，并且要对中国作出评估、量化、记录，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明显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学者是类似于英国的殖民官员和老式的东方学者，也不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虽然不是按照被殖民的印度人均标准来计算。但这是说，我们对于中国大跃进和饥荒的了解不是无辜的。权利与知识的关系，以及写作的问题，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西方和世界的话语生产。因此，正如詹姆斯·何伟亚

（James Hevia）在英语课程的工作中表明，殖民主义问题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中国，尽管它在近代的早期已经永远的失去了正式的政治主权。何伟亚（Hevia）指出，“中国知识生产的方式与其他殖民地的设置是相同的”（英语 348）。在我看来，尽管当代是后殖民主义的世界，那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计算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枚举的方式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例如在印度的殖民或者是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时代。但是，对于知识的渴望和知识/权利的动态，在我看来是十分相似的。知识生产的对立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的“兴趣”结构，在世俗方面仍在发挥作用。

中国始终在保持其主权，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的常识极大的影响着，通过与现代西方的接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西化和现代化的转变。20 世纪 2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学生都可以证明，对于西方以及西方主义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学者也表现出了自我厌恶，正如今天的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自主的反抗西方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崛起（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货币压力等。）同时，西方殖民中国或者帮助国民党进行安置宣告失败，并且在冷战中也不得不偿失，这似乎意味着西方的霸权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那么专横。这将采取“适当的政治”，主权保留太过严重。当然，极权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以及中国的非人道主义都是很大的悲剧，此外，还要承认中国与西方的新帝国主义问题，也包括知识生产水平的问题。大部分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不管三七二十一都陷入了妖魔化，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和集体化，还有党及其历史。甚至其失败一大跃进迄今为止仍然是杰出代表，它的处理被简单化，不需要对恐怖做出过多的同情。如何解释在过去的时期中，不存在人口普查，包括未出生的胎儿，项目的死亡率趋向于零/不朽的情况下，为何会有如此庞大的生产死亡数据？或者是一些名副其实的确定性中，除了所有可以证明的证据和论证，死亡一定会高于 1000 万或者 1500 万吗？在最近的说明中，有 4500 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不就之后还会超过这个数字，无论档案是否被公布，或者旧的人口普查的数据真的无处可寻。此次统计，不仅仅是关于实际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统计，还有其他相关。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东方

主义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有关，还与党国与中国的合法性，以及共产主义的想法相关。

笔录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时期，相比城市，农村“部门”在福利和社会商品方面仍受到较少的好处。这可能被视为一种偏见。但是在古老的城市和农村之间，这也是一个历史矛盾问题，农业社会不可避免的需要走向现代化。

帕特奈克（Patnaik）“毛泽东经济思想” par. 28.

看到他的智力和体力劳动：认识论的批判

Han 关于这些问题最近的看法是“自大跃进至今，农民、毛泽东、中国都怀着不满的情绪。”可见他早期的书，《未知的文化大革命》。

辛顿（Hinton）声称，新公社有 30% 的成功，30% 的失败，70% 的得过且过。尽管这是乌托邦式的，但是面对人口增长和全球性经济封锁的情况，仍然是有效的。

尽管后院炼钢炉在现在臭名昭著，这当然是失败之处，在这一古老的技术中，他们工作的地方已经有了传统和专业的知识。见瓦格纳唐纳德（Donald Wagner）的言论。

正如盖瑞（Gery）所说的那样，313

再者，看 Gary 关于大跃进《起义和革命》的章节，尤其是 308-15

正如里斯（Riskin）“七问”中指出，见 D 萨瑟兰（Southerland,）“镇压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里斯（Riskin）将饥荒的历史追溯到 1959 年也是值得强调的，因为许多学者会将饥荒从 1958 年开始算起，尽管事实是在 1958 年和 1957 年粮食的收成是十分可观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大跃进的激情和热度，似乎是一直没有死亡率上升的。

涂（Tu）的笔录中说“破坏性的趋向”，脚标 3。他关于此报告的文章引用是克雷曼（Kleinman），“经验的吸引力”。实际上时中国共产党在 1961 年的一份报告中声称全国有 3000 万的死亡人数，可以肯定的说，这会引来很大部分的档案的改变。

利斯西门（又名皮埃尔李曼德），中国阴影。利斯深深的哀叹毛泽东主义将北京帝国堡垒一样的城墙破坏。这种墙的建筑违背民主，更别说共产主义社会，似乎是比利时难以理解的老古董。在对利斯工作的批评中，有一篇爱德华 弗雷李曼的文章“利斯西门憎恨中国”。

13 见例，涂(Tu)的“人性与自我修养”。

见 Sen，自由的发展，以及“印度是怎样做的？”

科尔 (Coale)，中国人口的快速变化。班尼斯特 (Banister)，中国人口的变化。就像里斯 (Riskin) 所说，在年鉴公布大略的死亡率之前，只有这两篇文章提及了这个问题 (1981 年)。

在大寨自身遭到破坏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袖陈永贵，看到了秦怀路“九重天到第九层地狱的变化：高尚的中国实验的历史”，记录农村公社自上而下的毁灭。可见韩丁 (William Hinton) “伟大的逆转”，卡玛的纪录片“都在天堂之下” (1985)。

早在 1959 年，何炳棣先生，美国人口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就指出，1953 年的人口普查，再次基于区域样本，被很多“瑕疵所困扰”，鉴于这么多年的革命斗争以及内战，中国人口在 1947 年到 1953 年之间增长了 30% 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见何炳棣，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威廉姆 威特海姆 (Willem Wertheim) 回忆起在 1957 年与中国人名共和国人口统计助教陈达的对话，陈达也批评原普查缺乏科学性。可见威廉海姆的“野天鹅与毛泽东的农业战略”。感谢威廉姆弗兰克对本文来自荷兰的采购。

见他的英文教程。

援引布莱克 安东尼 C，“黑色的宣传”，卫报周刊 2000 年 2 月 24 日，此文献来自高，“辩论” 425。

盖瑞杰克关于大跃进以及其经济意义的谈论，起义与革命：中国的 1880-1990。

例如杨大力的“中国的灾难与改革”，张盖尼和温升豪的“中国 1958-1960 饥荒时期的公共餐厅”，22 韩的，“大跃进饥荒”。

威廉姆 韩丁“对休 迪恩的回应”以及他序言的深翻版，写道，“毛泽东，农村发展和双线斗争”。杰克盖瑞“起义与革命”关于大跃进的评论是贴切的，307-15

帕特奈克指出，这两个比率的提升代表了数以千万计的出生和死亡；在这这么多年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之下，出生率的大规模增长是极不可能的。

孙福兵，“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给出的 1964 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为 689705000。

这是任意插入的，因为当新的死亡发生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假设。

参见“饥荒” 53-64 页，对于技术讨论的扩展。

在俄罗斯瓦解之后，看到自己的“共和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批判甚至是承认失败，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自由市场的休克疗法。

因此它变得完全可以接受，即使是在“进步人士”或工会领导人对中国的阻碍之下，但不是说，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内。

最近对贝克尔的批判，可见保尔 詹斯佛。

对于常(Chang)和韩礼德学术回应的收集,可见格里高尔本顿和林春,东旭和 Q. M. DeBorja 的“制造业的历史”在这里也是十分有用的,这是对李志绥的回应。³² 可见注 6 和 7,402 页。

如前所述,里斯和其他人认为,直到 1961 年,这种努力没有完全成功。

见华志坚(Wasserstrom)例子“毛泽东事宜”

博尔赫斯,“科学的精确性”,自 1946 年进行讲述,可在线阅读, <https://notes.utk.edu/bio/greenberg.nsf/0/f2d03252295e0d0585256e120009adab?OpenDocument>.

看似复杂的问题在这里由另一个具象的策略表明。在这些研究中的一些点中,给定的段落包括了许多索赔,但是只有一个引文指向索赔的结束;在文本中,最后的引用备份了所有的索赔段落。

对于本书关于人口统计学的审查,请见 O'Grada,他经常提及帕特奈克。

大卫巴赫曼详细提及了官僚主义、经济、领导,以及针对大跃进期间的“规划”和市场的“渐进”,领导者们与政府对相关政策展开了相当多的讨论。地方自治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是有 Sen 提出。也请注意,毛泽东等人关于大跃进的灵感来自于河南和河北自发形成的公社。可见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 231.

这是由麦克法夸尔和泰韦斯发现的,他们关注于毛泽东对自己权利的迷恋(在彭德怀事件中)。他们错过了处理复杂饥荒问题的机会。

可见帕特奈克的“食物与饥荒:一个长远的眼光”,以及 Sen 在印度“前线”杂志多年来的文章。

Sen 的作品充满着对“市场”的积极引用,所以没有必要为大家再做说明。例如“食物与自由”(769, n68),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还包括“市场的解放”。

弗雷德里泰韦斯,“反常”,认为治理从来没有“制度化”,没有“政治角逐”和“计算”(只有服从/专治)。

参考文献

巴赫曼 大卫:中国的官僚主义、经济以及领导:大跃进的制度根源。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P), 1991 年。

保而 约瑟夫。“毛泽东真的在大跃进期间残害数以万计的人吗？”每月评论，2006 年 9 月。www.monthlyreview.org/0906ball.htm. 29 May 2011.

班尼斯特 朱迪。中国人口的改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 年。

贝克尔 詹珀。恶鬼：毛泽东的秘密饥荒。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96.1998 再版。

本顿、格林高本、林春。毛泽东真的是个怪物吗？对常和韩礼德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回应：鲜为人知的故事。纽约：劳特里奇，2009.

布莱克 安东尼 C: “黑色宣传”。曼彻斯特卫报周刊。2000 年 3 月 1 日至 15 日。

1-34.常，张盖尼和温升豪。“1958-1961 中国饥荒时期的公共餐厅”。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46（1997 年 1 月），1 到 34 页。

常，郑，约翰哈立德。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纽约：Knopf 出版社，2005.

Dikötter, 弗兰克（冯克）。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10.

董旭林和 Q.M. DeBorja。制造历史：关于性、谎言毛泽东医师登兰书屋回忆录。纽约：中国研究小组，1996. <<http://chinastudygroup.net/wp-content/uploads/2009/09/manufacturing-history-xulin-dong.pdf>>.

埃克斯坦 亚历山大。中国经济的变革。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

弗里德曼，爱德华。“西蒙 里斯厌恶中国；美国喜爱西蒙里斯”。亚洲学者的有关报告 10.3（1978）：19-27 页。

盖瑞，杰克：起义和革命：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的中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韩东平。未知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纽约：加蓝出版社 2000.

何伟亚，詹姆斯。英文课程：帝国主义 19 世纪在中国的教育。达勒姆：杜克出版社，2003.

韩丁，威廉姆。伟大的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0.

韩丁，威廉姆。“毛泽东，中国的农村发展和双线斗争”。每月评论 45.9（1994 年 1 月）。学术扩大 ASAP 项目。www.gale.com. 2004 年 6 月 18 日。.

何炳棣。对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

约翰逊，伊恩。“中国：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纽约书评。2012 年 11 月 22 日。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nov/22/china-worse-you-ever-imagined/>

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 2：1958-1960 年的大跃进。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迈斯奈 莫里斯。毛泽东时代以及之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修订和扩充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

Ó Gráda 科马克 “大跃进饥荒：回顾与思考。人口与发展评论 37.1 (2011): 191–210 页。

帕特奈克 Utsa. “食物与饥荒：一个长远的眼光”。长的过度：政治经济学论文集。德里：Tulika 出版社，1999。

帕特奈克 Utsa. “饥荒和饥荒死亡的测量。”印度社会科学思考：爱丽丝荣誉散文。舒亚塔帕特尔，Jasodhara 巴什，和 Krishna 拉吉。新德里：贤者，2002 年。

帕特奈克, Utsa. “饥饿的共和国” 社会科学 33.9–10 (2004 年九月到十月): 9–35 页。

秦怀路。九重天到第九层地狱的变化：高尚的中国实验的历史。翻译 Dusanka Miscevic. 再版，威廉姆韩丁。纽约：路障出版社，1995。

里斯 卡尔，“1959-61 年中国饥荒的七个问题”。中国经济评论 9.2 (1998): 111–24。

---中国的政治经济:自 1949 年追求发展以来。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7

森, 阿玛蒂亚 K. “印度是怎样做的?” 纽约书评 21, 1982 圣诞发行

森, 阿玛蒂亚 K. “食物和自由。” 世界发展 17.6 (1989): 769–81。

森, 阿玛蒂亚 K. 自由看待发展. 纽约: Knopf 出版社, 1999。

森, 阿玛蒂亚 K. “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 民主杂志 10.3 (1999) 3–17 页。

索恩雷特尔,, 阿尔弗雷德。智力和劳动手册：认识论的批判。纽约: 麦克米伦 1978。

孙福兵。“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趋势与启示。” 亚太人口杂志 13.4 (1998 十二月)。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101124030/
www.unescap.org/esid/psis/population/journal/1998/v13n4dn.htm](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101124030/www.unescap.org/esid/psis/population/journal/1998/v13n4dn.htm). 2011 年 5 月 29 日

Sun, Warren. (孙万国 2013), (“毛泽东的“手枪冒烟”了吗？——质疑《大饥荒》作者冯克 (Frank Dikötter) 的学术造假”), (当代中国史研究述评国际研讨会) (北京, 6 月 25-27 日, 2013。

.泰韦斯 弗雷德里克。“毛泽东时代变迁的悖论性矛盾：从服从领袖到“正常”的政治”。中国期刊 34, (1995 年 7 月)：55-94 页。

涂伟明。“破坏性的意志和思想大屠杀：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社会苦难的来源”。戴达罗斯 125.1 (1996 年冬): 149–180 页. 53 pars.

涂伟明.。人类和自我修养:儒家思想随笔。伯克利，加州：伯克利亚洲人文出版社，1979。

---. “破坏性的意志和思想大屠杀：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社会苦难的一个来源，”戴达罗斯 125.1 (1996 年冬): 149–180 页. 53 pars. 学术扩大 ASAP 项目. <<http://www.gale.com>>.

瓦格纳，唐纳德。传统中国钢铁工业及其现代命运。彼得诺兰序言。伦敦：寇松出版社 1997. www.staff.hum.ku.dk/dbwagner/Fate/Fate.html. 2009 年 6 月 2 日。

瓦施顿 杰佛里 “毛泽东的问题：回顾文章”国际中国评论 3.1 (1996)春: 1–21 页.

沃特海姆，WF。 “野天鹅与毛泽东的农业战略.” 澳大利亚中国评论（1995 年 8 月）：7-9 页。

杨大力。 “中国的灾难与改革: 大跃进之后制度、农村社会和机构的变迁。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杨济生。墓碑：中国大饥荒，1958-1962。翻译和对校，斯泰西毛思迪等。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2013。

姚树洁 “1959–61 中国饥荒的影响因素的思考.” 政治经济学杂志 107.6 (1999 年): 1365–9.